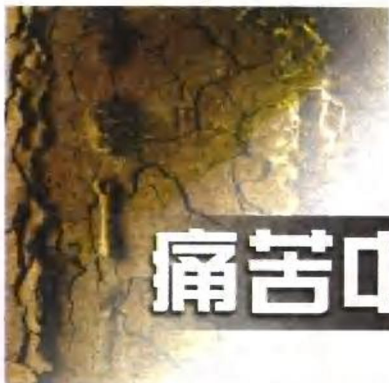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痛苦中的安乐

论消费主义

马尔库塞
弗洛姆

陈学明 吴松 远东 编

生活哲学文丛 (2)

编 者：陈学明

吴 松

远 东

责任编辑：马 清

封面设计：袁亚雄

痛苦中的安乐

——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96千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2-02321-6/G·268 定价：13.90元

前 言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度的精神堕落，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西方不少学者不但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而且还对此作了很多分析研究。在这些西方学者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 Marcuse）和弗洛姆（E. Fromm）了。他们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在充裕的物质生活后面蕴藏着的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这一“病态”的揭露，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可以称作是“现代富裕社会”。因为在这一社会里，物质财富确实极大丰富，不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老板们过着吃穿不尽的生活，而且处于社会低层的平民百姓也是丰衣足食。“工人和他的老板欣赏同一电视节目，游览同一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和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妩媚动人”。那么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富裕，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他们认为并没有。他们指出，消费者的天堂没有给以它所允诺的快乐，这种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以牺牲精神生活为代价的。他们主要用“人的需求遭致歪曲”、“人

前
言

二 成了商品的奴隶、消费的机器”、“人过的是占有 (to have) 而不是存在 (to be) 的生活方式”来加以说明。

痛苦中的安乐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人的幸福。他们指出，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唯一的需求，甚至还不是主要的需求，追求幸福的欲望并非就是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因此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幸福。人与动物不同，他非但不满足于锦衣玉食，而且还力图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加高尚的东西。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在精神上感到莫大的痛苦，主要原因就在于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第一、甚至唯一的需要，从而把自己降低为一般的动物。

现代西方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它为了使生产从而使整个社会制度连续下去，必须使产品得到消费。生产得越多，就要求消费得越多。那么它怎么样使它生产的产品得到消费呢？他们揭露说，它主要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一社会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刺激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们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真正的需求”。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来说，这变成了它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其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消费者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

他们指出，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加之于人后，就出现了个人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统治之下人所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们拥有自己的高级住宅、轿车、彩色电视机，不言而喻，还有吃和穿的东西，这当然是够“安乐”的了。但须知，这是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安乐”。全部的关键在于，

人们在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基本，甚至唯一需求以后，实际上他们已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人与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他们还指出，消费的行为本来应该是一种有意义、有人味的行为，但如今这样的消费行为是少之又少。人被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所迷惑了。人在消费上，永远感到饥饿。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拥有更多、更好、更新的东西。实际上，人已完全变成为被动的消费者，成了行尸走肉。这一社会制造了许多无用的东西，也同样制造了许多无用的人。由于实行消费主义，现代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是“占有”而不是“存在”，所谓占有方式乃是指一个人试图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变成为自己的财产；而所谓存在方式乃是相对于占有而言的：一个人并不因为他所拥有或占有的一切而存在，他的存在正是他独立、自由、批判理性、创造性、主动性，以及爱、给予、富有牺牲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才是人的真实的存在。现代西方社会所实行的是“越多越好”的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支配下，人的生活都以占有为宗旨。

人被产品所支配，这当然是莫大的痛苦。但人们往往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他们强调，人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不等于痛苦的不存在。相反，这恰恰表明其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明明处于痛苦之中却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一个病人，如还感到有病，那这个人还有救，但是假如他把自己言的病当作健康，那表明这个人已处于纯粹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三

四 痛苦中的安乐
态。现代社会中的不少人正是一些“连痛感也消失掉的最痛苦的人”。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最正常的人也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的命题。

无疑，马尔库塞、弗洛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这种批判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其中最大的一个片面性就是把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全对立起来。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痛苦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于物质生活资料丰富造成的吗？在物质丰富与精神痛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的同时，忽视乃至抹杀物质生活对人的重要性，否认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这是错误的。他们把物质生活资料的充裕看作是导致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提出“生产力的发展 = 物质财富的丰富 = 精神生活的痛苦”这样一个公式，这更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痛苦决不是由生产力、物质财富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这一制度对生产力、物质财富加以“资本主义式”的运用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完全有可能使生产力、物质财富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愉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尔库塞、弗洛姆对现代西方社会批判的这种片面性，源自于批判的理论依据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他们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批判这一社会摧残人性。他们所说的消费主义下的人的精神痛苦实际上就是指“丧失了人性”的痛苦。这是早被马克思主义扬弃了的以抽象地揭示“人性与社会之对立”为标志的人本主义的批判。

马尔库塞、弗洛姆的批判尽管具有片面性，但对现代人不无启发作用。环顾当今世界，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现代人是否真的非常

幸福，这是人们所关切的问题。马尔库塞、弗洛姆以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在精神上正处于异常痛苦的事实，揭示了物质方面的富裕未必就能给人带来幸福这一真理。他们再三阐述的是：人们的需要不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因此人们的追求也不应仅限于追求物质利益。如果人们的注意力仅限于追求物质享受，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走向没落腐朽的“病态社会”，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则意味着变成了畸形发展的丧失人性的人。在这里，马尔库塞、弗洛姆不仅从哲学的高度分析批判了消费主义，而且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否正确，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人活着不仅需要面包，而且需要阳光和真理”，读了马尔库塞、弗洛姆的论述，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句宗教名言。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不正是说明缺少阳光和真理吗？马尔库塞、弗洛姆的论述绝不是空穴来风。

编者

1997.12.10

前
言
五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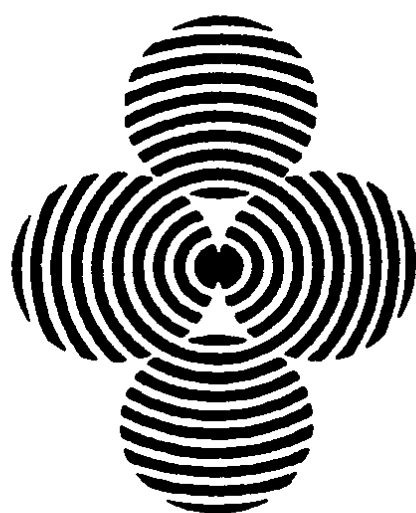
【1】	前 言
【1】	上篇：马尔库塞论消费主义
[3]	1. 推行消费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控制人的新形式
[25]	2. 痛苦中的安乐：在消费主义统治下的人的生活
[57]	3. 用真实的需求代替虚假的需求：人类必须解决的课题
[77]	4. 技术进步和劳动合理化：走出消费主义的阶梯
[95]	5. 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111】	下篇：弗洛姆论消费主义
[113]	6. 警惕，工业社会正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
[151]	7. 消费者的天堂并没有给予它所允诺的快乐
[185]	8. 要存在，不要占有
[207]	9. 探索超越人的生存需要的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
【239】	后 记
【242】	资料来源索引

上 篇

马尔库塞论
消费主义

1.

推行消费主义：现代西方 社会控制人的新形式



在劳动生产率这样增长和商品不断越来越充裕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对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的操纵和摆布，这已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最必不可少的控制结构之一。

在劳动生产率这样增长和商品不断越来越充裕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对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的操纵和摆布，这已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最必不可少的控制结构之一。新的需要被一次又一次地渲染起来，煽动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使他们相信自己确实需要它们，而这种需要可以从这些商品中得到满足。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而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制度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改造了一番。这些商品非买不可，因为别人都买了，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要的的确确被刺激和渲染起来了。

这样一来，就得给他们钱，由于商品总是越来越贵，这也就使生存斗争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尽管如果把劳动和社会财富作一合理分配，可以把生存斗争的压力减轻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可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趋势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积累起来了，生存斗争也加紧了，一点也没有变得轻松一些。工人的融合还在继续，但是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这种融合是在减弱下去。我相信内在的矛盾今天比一年以前要明显得多，即使在所谓的中间阶级当中——即资产阶级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认识到，为所谓消费社会中的相对繁荣，付出的代价是太高了。……当然，这就要求为了最迫切的目标而废除存在于所谓消费社会中的一部分

六 愚蠢的浪费，也就是说，取消继续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且不停地重复制造出来的贫穷和痛苦。

痛苦中的
安乐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而且，这种一体化曾一直伴随有较明显的强制形式：剥夺生计、司法管理、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如此。但目前阶段，技术的控制像是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的理性之体现——以致所有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所有反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社会控制已投入要害之处，甚至个人的抗争也从根本上受到侵袭。思想上的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这就是作为目前阶段之标志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心理学方面：那些在工业社会的以前阶段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历史力量消逝了。

如果社会不能用它日益提高的生产来减少压抑，那么生产就必然会与个体相对抗；它本身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

把个体从曾为缺乏和不成熟所辩护的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可能性越大，想维持这些压制并使之合理化，以免现存的统治秩序被瓦解的要求也就越强。文明不得不抵御自由世界的幽灵。如果社会不能用它日益提高的生产来减少压抑，（因为否则就有可能打乱现存的等级秩序）那么生产就必然会与个体相对抗；它本身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极权主义笼罩着后期工业文明，生产被统治利益所支配，因而其潜能也被抑制和转移。人们被迫进入一种内部和外部的持久的戒备状态。统治的合理性发展到了有可能动摇其基础的地步；因此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重申这种合理性。这种时刻弑父现象不再会出现，哪怕是“象征性地”出现，因为父亲的继承者已经不存在。

所谓超我的“自动化”表明了社会用于抵抗这种威胁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意识而不是对本能的控制。如果让意识放任自流，就可能在需要得到的更大更好的满足中出现压抑。这种贯穿于整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对意识的操纵，在对集权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各种解释中，都被描述为对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自发反应和必要反应的调节。提倡“无思想的闲暇活动”，推行反理智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对意识的操纵的若干实例。控制由于扩大到了以前曾是自由的意识领域和闲暇时间，就有可能放松对性

欲的禁忌。这种禁忌在先前由于不能那么有效地实行全面的控制而显得十分重要。较之清教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今天的性自由无疑是更大了（虽然对1920年革命的反抗非常显著）。然而与此同时，性关系也更加密切地与社会关系同化了；性自由与有益的顺从一致了。性和社会功用之间的根本对立本身反映了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这种对立现在由于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不断侵犯而被搞得模糊不清。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必将成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必将全盘否定支配着压抑性现实的原则。在西方文明中，文学巨著只赞颂“不幸的爱情”，崔斯坦神话成了这类作品的典型，这也决非偶然。崔斯坦神话中那种可怕的浪漫主义，严格地说，是“现实主义的”。与解放了的爱欲所具有的破坏性不同，在垄断控制的坚固制度内部，性道德的松弛倒是有助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否定与肯定、黑夜与白天、梦想世界与工作世界、幻想与挫折，都被协调一致起来了。于是，在这个被控制得井井有序的现实中获得松弛的个体所能回想起的，不是梦想，而是工作；不是童话，而是对童话的斥责。至于在爱欲关系方面，这些人则凭借其天赋的魅力，通过谈情说爱和他们所喜爱的广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